

隐喻的视觉维度:石海彬《绘画隐喻学》的体系建构与学术价值

王武言

一、引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隐喻研究在国内人文社科领域逐步成为重要研究热点,研究范畴从传统语言学、修辞学不断延伸拓展至认知科学与文艺美学领域。耿占春、束定芳、胡壮麟等学者深耕语言隐喻研究,成果丰硕;王炳社则通过《隐喻艺术思维研究》《艺术隐喻学》等著作,完成了艺术隐喻的整体理论建构^[1]。但正如石海彬在书中所言,当前国内外绘画隐喻研究成果零散、数量匮乏,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性框架^[2]。这一学术短板,成为该书的写作立足点,也极具拓荒价值。

《绘画隐喻学》聚焦核心学术问题:若艺术本质是隐喻性^[1],那么以视觉形象为核心媒介的绘画艺术,其隐喻的发生机制、表现形态与审美价值具备何种独特性?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全书八章内容搭建起贯通发生学、方法论、历史叙事与当代艺术批评的完整研究框架。

二、内容述要与体系架构

全书八章内容逻辑递进、层次清晰、架构严谨。绪论率先搭建完整的基础理论框架,精准界定绘画隐喻的核心性质与基本特征,确立以“审美意象”为核心的研究路径。作者提出,绘画隐喻的核心本质是依托绘画语言,将主体内心世界转化为审美意象并完成表达,受众通过解析绘画语言与视觉意象,体悟作品深层的象征意蕴^[2]。

第一、二章为全书的发生学与历史溯源板块。作者将绘画隐喻的哲学根基锚定在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传统与“取象”思维之上,依托《周易》“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等经典论述^[3],印证了隐喻思维与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内在同源性。历史研究采用中西对比的研究框架:中国绘画隐喻始于原始彩陶与岩画符号,历经先秦两汉的政治伦理隐喻、魏晋的士人精神隐喻、隋唐五代的宗教与政治双重隐喻、宋元文人隐逸隐喻,以及明清的个性表达

与社会批判隐喻^[4],清晰呈现出从巫术实用向纯粹审美逐步转型的发展脉络;西方绘画隐喻则以古希腊神话叙事为源头,历经中世纪宗教象征、文艺复兴人文表达、巴洛克情感宣泄,延伸至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探索^[5],为全书跨文化对比研究筑牢基础。

第三、四章构成全书的核心理论体系。作者明确绘画隐喻的本质是艺术家认知世界、抒发情感的核心艺术方式^[6],其系统性、模糊性、象征性三大特征,分别对应作品的内在叙事逻辑、意义的多元开放性与精神内涵的超越性。在价值层面,作者提出层级化论断:隐喻是绘画的根本思维方式,能够深化作品象征内涵、强化情感表达张力,这一观点将隐喻从单纯的艺术表现手法升级为核心艺术思维本体的层面。

第五至七章聚焦方法论研究,系统阐释绘画隐喻的思维流程、表现方式与构成元素。作者构建“比较类比—联想想象—意象象征”的递进式思维机制,总结出节奏、韵律、对比三大核心表现方式,明确点线面、黑白灰、色彩、构图四大基础构成元素^[6],形成由内而外、从抽象理论到具体形式的逻辑递进。第八章选取具象、意象、抽象三类主流绘画样式开展隐喻解读实践^[6],实现了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的学术闭环。

三、理论贡献与方法论特点

该书首要的学术价值,是完成了绘画隐喻研究的体系化奠基。过往研究中,绘画隐喻多作为艺术隐喻的分支被顺带提及,缺乏独立、系统的研究框架。石海彬以专著形式,搭建起涵盖哲学根基、历史演进、本质特征、思维机制、表现技法与批评实践的完整研究体系^[6],填补了国内专项研究空白,具备重要的学科奠基意义。

其次,该书打通了“审美意象”与隐喻理论的学术壁垒,构建了有效的理论对话路径。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体系与莱考夫、约翰逊为

代表的西方概念隐喻理论^[7],长期存在理论对话脱节的问题。作者创新性地以“意象的隐喻性”为契合点,提出意象以具象载体承载抽象内涵的运作逻辑,与隐喻跨域映射的认知结构高度同源,为中国传统美学阐释绘画隐喻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支撑。

同时,全书彰显出“以中化西”的本土理论自觉。作者摒弃生硬套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绘画的研究范式,以中国古典美学“意象”“意境”“气韵”等范畴为核心脉络,将西方隐喻理论作为对话参照资源^[8]。

在实践层面,该书对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具备极强的指导意义。对创作者而言,书中对隐喻思维、表现手法的系统梳理,为创作中自觉运用隐喻技巧、深化作品内涵提供了参考;对批评者而言,书中三类绘画的隐喻解读路径^[6],为美术作品的深度阐释提供了可落地的分析框架。

四、若干学术思考

该书作为拓荒性著作,学术价值显著,但仍存在可完善与深化的空间。

第一,理论体系存在局部内容重叠。书中“隐喻的价值”与“隐喻的特征”两大章节论述边界模糊,概念界定与层级划分有待进一步厘清。

第二,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深度不足。缺乏同维度的直接对比与深度对话。例如中西宗教主题绘画、宫廷绘画均蕴含隐喻属性,但中国佛教壁画与西方基督教绘画的隐喻运作机制、中国宫廷绘画的教化隐喻与西方宫廷绘画的权力隐喻^[9],二者的异同与结构性差异未展开深入辨析。

第三,受众认知心理机制研究较为薄弱。书中对隐喻联想、想象的分析多聚焦于创作主体,对受众接收、解读隐喻的认知过程探讨不足,未充分结合格式塔心理学、认知图式等理论成果阐释受众的隐喻解码逻辑。同时,外文献储备不足,与国际学界的学术对话空间仍

可进一步拓展。

五、结语

综上,石海彬《绘画隐喻学》是一部具备高度学科自觉的拓荒性学术著作。全书以“隐喻是绘画的根本思维方式”为核心轴心,构建起贯通历史、理论与批评的三维研究体系,为国内绘画理论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该书既为艺术学理论、美术学、认知诗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也为后续研究留存了充足的学术对话空间。正如作者所言,该书仅是绘画隐喻研究的学术起点^[10],依托这一研究基础,未来可开展更多专项研究与跨学科探索,而宗白华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理论,也可为视觉隐喻研究提供经典的美学参照。

参考文献:

[1]王炳社. 艺术隐喻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2]石海彬. 绘画隐喻学[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

[3]叶朗. 美学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薄松年. 中国绘画史[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5]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 外国美术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王炳社. 隐喻艺术思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8]张沛. 隐喻的生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陈传席. 中国绘画美学史[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

[10]宗白华. 美学的散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高校干部正确政绩观:逻辑理路、现实偏失与实践建构

马小雷 周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推进干部正确政绩观建设,提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价值标尺。高等教育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高校干部政绩观直接决定办学方向、育人质量与长远发展,核心是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根本教育命题。

一、高校干部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溯源与逻辑生成

(一)理论溯源:从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到新时代教育领域政绩观演进。马克思主义明确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这一论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人民性根本底色。我国百年办学实践持续丰富教育政绩内涵,建国初期时教育服务工农与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兼顾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新时代将立德树人确立为高校根本任务,明确高校政绩不同于行政、企业单位,短期科研、经济指标不能替代人才培养长远价值。

(二)价值逻辑:为党育人是政绩建构的根本立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高校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高校政绩评判需统筹师生、国家、产业三方长期诉求,搭建完整价值坐标系。一是立足师生现实诉求。摒弃重管理轻服务思维,以青年教师发展保障、学生心理帮扶、行政办事效率等师生可感知指标检验治理实绩。二是对接国家人才战略。跳出排名与校内指标竞争,以化工、能源等紧缺领域人才供给质量、毕业生服务关键行业比例衡量办学价值。三是适配产业转型需求。破除唯论文导向,以关键技术攻关、科研成果产业化评判科研真实贡献。

(三)认知逻辑:立德树人是政绩界定的核心内涵。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专属核心职能,高校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均需要围绕立德树人展开。高校政绩分为显绩、潜绩两

类:显绩周期短、可量化、直观可见,包含年度科研经费、高水平论文、校园基建、人才引进数量、短期评估排名等;潜绩周期长、成效隐蔽、难以量化,涵盖师德师风长效建设、学风传承、学生素养培育、基础学科长线建设、困难学生帮扶、青年教师梯队搭建等。

(四)实践逻辑:久久为功是政绩生成的行动准则。正确政绩观要求系统长效的干事方法,核心是摒弃急功近利、突击造势心态,统筹教学、科研、党建、社会服务全领域工作。一是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民主科学依法决策,杜绝干部凭个人意志上马形象工程。二是均衡统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扭转长期重科研、轻教学的结构性失衡。三是主动化解办学遗留难题与深层治理矛盾,杜绝以文件、会议代替实干,坚持深耕细作推进内涵建设。

二、高校干部政绩观的现实偏失与诱因传导机制

(一)政绩观偏失分层现实样态。高校政绩观偏差共性问题集中体现为三类。一是重短期显绩、轻长远潜绩,办学功利化。受评估排名压力,偏重人才引进、科研经费等指标,院系干部扎堆推短期课题与论文产出,基层党务干部应付量化党建台账,造成外延扩张与内涵育人失衡。二是重纸面流程、轻育人实效,形式主义突出。各类检查考核占用大量精力,干部埋头整理材料台账;育人政策仅停留在发文宣传,配套保障缺位;基层重复填报报表,弱化立德树人实效。三是重量化数据、轻发展质量,评价导向扭曲。校内统一量化绩效覆盖全部岗位,职称、绩效、干部选拔过分看重论文项目;校级汇报侧重年度增量,育人、师德权重偏低。

(二)政绩观偏失诱因及循环传导机制。政绩偏差是干部自身、考核制度、外部竞争三重因素循环叠加形成的恶性循环:外部评估竞

争倒逼量化考核机制,短期考核加剧干部任期焦虑、理论学习虚化,最终驱使干部追逐显绩、忽视潜绩。外部层面行业竞争与社会观念双重裹挟。学科评估、商业排名将办学简化为数字,人才评选零和竞争;社会唯论文、唯学历观念持续施压。制度层面考核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考核以年度短期评价为主,缺乏长周期育人评价;资源分配、干部任用绑定短期指标,固化“数据即政绩”的错误认知。

三、高校干部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建构——以H大学为例

针对三类政绩偏差,H大学立足化工行业特色,构建“思想铸魂—制度革新—党建赋能”三维协同治理体系,形成可推广的行业高校治理范式。

(一)思想铸魂:分层党性教育校正功利认知。学校搭建校、院、基层三级靶向学习机制,将正确政绩观论述纳入各级党组织“第一议题”,针对不同层级干部设置差异化学习主题,破解学习同质化、认知短视问题。常态化开展正反典型警示教育,定期组织干部自查、征集师生意见,树立久久为功的办学导向。联动中石化、万华化学等行业企业开展产业联学,组织干部下沉院所、产业一线调研,破除纸面政绩思维,夯实内涵发展思想根基。

(二)制度革新:评价改革破除形式主义与唯量化误区。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学科布局、重大平台建设集体论证,从源头杜绝形象工程与台账内卷。修订中层干部年度考核办法,将党建成效、本科教学质量、师生满意度设为核心考核指标,提升师德培育、青年教师帮扶、育人实效等潜绩权重,下调短期科研指标分值。对深耕基础育人、长期贡献突出的干部予以晋升倾斜,从严问责形式主义办学行为,持续优化治理生态,提升师生获得感。

(三)党建赋能:嵌入式党建统筹消解政绩

分层偏差。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改革,推行“党支部建在科研平台、学科团队、重大攻关项目”嵌入式模式,常态化公开党建治理数据,实现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全覆盖,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搭建“校党委—职能部门党委—院系党委—基层党支部”四级党建责任链条,落实党建与学科、教学、科研、育人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依托“1+3+17”立德树人改革体系,组织学生深入产业一线实训,引导干部立足国家战略深耕育人,从业务层面扭转重科研轻育人偏差。

四、结语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高校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是核心政绩、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价值坐标。以分层常态化党性教育校正干部短视思维;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提高潜绩、师生满意度、国家战略贡献考核权重;以标准化嵌入式党建筑牢治理根基,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深度融合。引导全体干部遵循高等教育长周期发展规律,多做惠师生、利长远、强国家的潜绩实事,持续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基金项目:2026年华东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高校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探索”(编号:YP0708103);2025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产教融合急需人才培养项目(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专项课题“‘共’‘学’交融:卓越工程师能力培养机制研究”(编号:SZ250YP0701);2026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网络群体极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应对研究”(编号:C2026243)。

作者周洋系本文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